

## 城大访学记

(2016年4月第2期)

刘宪阁

有幸作为“多友”到城大参加为期一个月的访学活动，无疑是一段难忘的经历。而能够得以顺利成行，当然要感谢香港城市大学，感谢媒体与传播系，尤其是李金铨老师。

### 从一封邮件说起

最早从哪儿听说李老师的名字，已经不太记得。但是印象中当年曾经有次邮件请教。前两天专门查了下，原来是2006年12月31日（按此为拟稿日期，因为一个失误，实际发出则为2007年1月4日）。那时还在北大历史系读博，曾经一度打算接续硕士论文的主题，围绕1950年代末期中国的“劳动”展开。后因各种缘故，改而从事有关报人张季鸾之研究。



那时经常在网上搜索浏览相关信息。某天偶然获悉，2007年4月香港城市大学将举办一场题为“自由的理解与实践：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”的学术研讨会。而召集人，就是彼时还很不熟悉的李金铨老师。从后来披露的访谈可知，他那时正对既有新闻史的研究状况感到难以满意，并对新的探索产生了兴

趣。这次的讨论主题应该也是由李老师拟定，诚如会议宗旨所言，当时学界的相关讨论确实可以说才“刚刚起步”。同时，因关涉“理论视野”，又须兼顾“史料分析”，特别是两者的结合，个人以为更具挑战性。那会儿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在学业尚未结束、仍旧游移于历史学和政治学边缘之际，个人以为“理论视野”或许更具典范意义；甚至在还不熟悉新闻史、仍属于外行的情况下，贸然以为：“这也几乎击中了以往大陆新闻史研究中的一个主要症结或者死穴：缺乏‘问题意识’，特别是‘较具理论问题意识’的研究”（见给李老师的邮件）。

如前所言，我当时博士论文的选题也与研讨会的主旨多少有些相关，甚至可以说是暗合。因为要把握张季鸾、大公报与现代中国政治，实际上必然也要涉及，或者说本身就是一个对“自由的理解与实践”问题。因此对这个活动很感兴趣（其成果即后来那本非常畅销的论文集《文人论政》；后来的第二届活动，则汇聚成《报人报国》，俺早就收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赠书，可是书评任务迄未完成）。



可惜，当时从网上所获得的资料有限，仅有高力克教授的论文摘要，其他如桑兵、章清等诸先生的作品则尚未见其大概。特别是备选论题中，曾提及大

公报和星期评论等（当时还不知道小兵兄在作这方面的研究）。因此当时不揣鄙陋，按照网页所留的联系方式，冒昧给李老师发邮件请教，并承回信解疑。

### **赴港前的几次接触**

写信那会儿，完全没想到，自己博士毕业后，居然也从历史学跳开，转而开始涉足新闻史研究领域。而随着对新闻传播学科的了解，对李老师，对“多友”，也有了更多的认识乃至向往。

仔细算起来，从2006年底和李老师初次邮件交往，到2016年春作为“多友”，真正到城大交流，已有十年。当然，这期间固有种种机缘，而特别要感谢的，应属王晓梅老师。我们是2010年夏北大新闻学史论师训班上认识的。她在很多方面对我给予了指点和帮助，特别是多次提及李老师，并介绍了“多友”这个神秘组织的有关情况。

第一次见到李老师，应该是2014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第一届政治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。那晚在咖啡厅，得以拜谒李老师，并见到好几位多友，除了东道主何晶，还包括“教主”陈先红等。再次见到李老师，是2015年7月初，在辽宁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一个研讨活动上。那天早晨报到时，我在涵月宾馆的大厅碰到了半夜抵达、正准备外出锻炼的李老师。这般年纪，身体素质和精神面貌还是如此之好，在暗暗称赞之余，不禁心生羡慕。



随即不久，就是8月中旬的榆林张季鸾之会，再次见到了李老师（报告全文见去年的《新闻记者》，当时朋友圈刷屏）。当时谈及李红涛、黄顺铭诸兄等已经可以独立开展自己的研究，李老师深感欣慰；还有指导学生等种种细节，洋溢着浓浓的师生之情。那天李老师还谈到因为有社会科学训练的功底，他往往能在调查访谈中旁敲侧击，在不经意间伺机跟进，直捣老巢，最终有所发现，且事半功倍。那个事例至今印象深刻。

随后就收到了2016多友申请的消息。在几个题目之间犹豫许久，我最后还是以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的话题递交了申请。10月27日下午在微信里得知结果并获邀入群，有幸入选，不胜感激。

尤为幸运的是，趁中青院第二届政治传播论坛，李老师又来北京。头天下午他还应邀到北师大新闻学院进行学术交流。下午和许多慕名而来的朋友们一起围观了报告，晚上和向芬作为未来新多友的代表，在晚宴上得以结识人大、清华、传媒大学等一众多友。



转而就是2016年春南京的多闻论坛。承李老师美意，应约前往交流，得见各地来参会的众位多友。当然，这几次也都发现，熟悉的朋友中，有不少早已成为资深“多友”。写到这里，想起前两天在老同学处随手翻开的《侠客行》：众位到了侠客岛，大有相见恨晚，怎么才来的感觉。

### **香港，我来了**

期间承蒙李老师和媒体与传播系办公室诸位老师关心我的签证进展。按我的港澳通行证是以前在北京办的，早已过期；2012年春到沈工作后，身份证未及时更换，这次又得在户籍地沈阳重新办理身份证，然后再办签证。好一顿折腾。直到3月18日才拿到临时身份证，31日临出发前才拿到港澳通行证。

先飞南京参加多闻论坛，之后于4月5日继续飞往南国深圳。下午三点多一下飞机，热气扑面而来。此前从沈阳到南京，就穿的很厚；再到深圳，更是被周围人另眼相看，视为怪物。顺便说一句，五月初北返，在长春龙嘉机场，周围人都是长袖，只有我和另两位从广州飞来的是短袖。周围的人同样以怪异地眼神瞅着我们。

在罗湖顺利通关，搭上港铁。出了九龙塘，发现又一城，问路也很踌躇，生怕遇到传说中拒斥内地客的年轻港人。硬着头皮问了两次，幸而都还不错。第二个还用手机地图帮着指示，说前面第三个路口拐进去即可（当时很感慨，手机没了信号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很无助啊。当然幸而鼻子下面还有嘴可以问人）。

大概七点半，终于摸索到了海棠轩宾馆。却发现里面是基督教女青年会。后来老大刘斌笑谓，我们可谓与此格格不入：非基督，非女性，更非青年……

进了房间，发现网线不好用。正发愁呢，赶上下午先到的刘斌、张杰等回宾馆，他俩来敲门，我正鼓捣网络呢。于是改用无线。登录微信，和小家伙娘儿俩视频通话，又用有信网络电话和老家亲人通话。自五点过关，短暂失联两个多小时后，又和世界联系上了。



（最右为当晚稍后抵达的齐辉。虽然没带小黄条，但是机灵的他还是设法过了关。欲知详情如何，且请本尊分解）

顺便一提，访学期间去长洲，探险张保仔洞。从阴暗潮湿狭窄的岩缝里钻出，最大的发现是：两部未开通漫游的手机，居然都收到了久违的内地短信（虽然是信用卡催账的）。祖国啊，没想到此时离得这么近。

## 城大印象

久闻城大是有名的一座楼的大学。到了才发现：居然已经不止 AC1，而是发展到 AC3 了。并且通过大学道去媒体与传播系，还得爬山!!! 其所在的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，据李老师等介绍，是全球校园十大最美建筑之一。看似奇形怪状的设计，有着丰富的寓意。只是我们每次都从校内经过坡下而至，没从深水埗方向看起来，其实那个角度也很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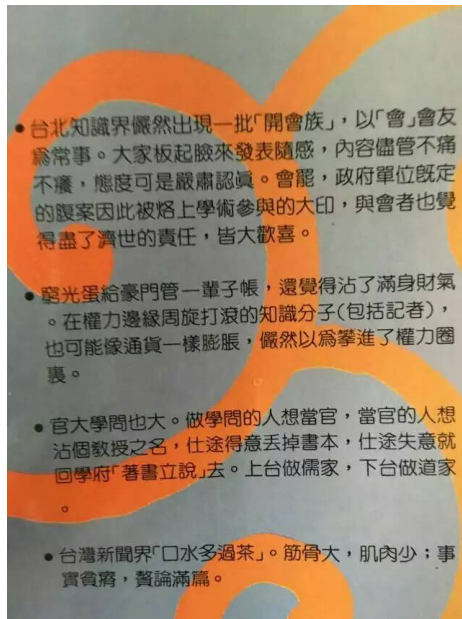


(真没从这个角度看过中心)

访学期间都没怎么好好参观这座建筑（除了常去的五层，因为办公室和分享会在那儿）。直到最后要离开，特别是头两天，才到九楼的平台好好观赏了一番。可惜天公不作美，远望港岛，看得不是很清楚。离开前那一晚，从九层看出去的夜色，也是美得不要不要的。大家慨叹：可惜都要走了，才发现楼内的这些好去处（还有烧烤架和小桌子，本来可以喝酒呢），来不及享受了。

城大图书馆也是好去处。只是熟悉其分类规则和索书号颇费了些时间。某日和刘斌、张杰去探险，(◕◦◕)哇！居然发现馆藏李老师的几本书！（当然还

有徐佳士等老师的书) 尤其是《新闻中的政治、政治中的新闻》等 1987 年出版的两本更好玩儿。关于学术会议的乱象，关于专家意见与政府咨询，说的虽然是三十年前对岸之事，对今时今日的此间仍适用，希望有机会可以推出内地简体版。



(三十年前的观察：李老师 1986 年写于台北客座。后收入《吞吞吐吐的文章：新闻界与学术圈》。台北久大文化公司 1987)

城大老师们的分享都各具特点。比如李喜根老师很严谨，新华社特稿部记者出身的何舟老师则很能侃。而周南老师上课时，在桌上那随性洒脱的盘膝一坐，至今想起来都还如在眼前。还有几位分享者的学科背景亦很有趣，比如来自日本的小林和来自 Seberia (是这个词儿吧？这到底是哪儿，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) 的 Marko 都受过心理学训练。梁励敏老师很知性，思维缜密。林芬博士亦是才女，据李老师说还是文章高手，本来还想如上期多友那样，再叨扰让她分享一下分章写作，可惜时间匆促，没能实现。祝建华老师的大数据研究很前沿，可惜作为外行，只能不明觉厉了。李宏宇老师的纪录片尝试，尤其是家族相册系列，则令人思之怅然。





老顽童般的周南教授

办公室的 Kitty 等几位老师亦很热情周到，为大家提供各种服务。我们几位多友绕嘴的发音，也让他们辛苦不少。尤其是我，更添一层麻烦。因为本期其他多友的名字都是两个字，只有我是三个字。临走那几天，为了在康乐楼订餐，也没少麻烦他们。

### **大彩蛋**

承李老师美意，我们躬逢其盛，蹭听了一次香江雅集活动，主题是葛兆光的演讲。大概是考虑到听众背景的关系，不少内容并非前沿，而是相关学科领域的常识或者基础性的东西。比如俄国特别是日本，在近现代中国思想（传播）史、特别是异域观念接受史中的二传手地位。因此听了难免有不解渴之感。



当然亦有可记者。一是名家云集。除了主持者张隆溪教授，还有被葛氏夫妇笑称为“国师”的陈来之师兄，即刘笑敢，不断插话逗笑；而且从签名录上看（据说每次活动必签名留念，我们几个围观的，居然也被邀签名留念），还有不少名人，如曾经培育出英年早逝的才子张晖、掌掴甘阳的李思涯博士之陈国球，以及刘再复教授的女儿刘剑梅等。



其二，也是最大的彩蛋，莫过于活动后邂逅了传说中的李欧梵教授（详参向芬等之记述）。从康乐楼下来，一路相送到又一城后面的小巴车站。获知我们到李金铨老师处访学，他很高兴。而闲聊中，隐约似亦感觉到老先生的孤寂与落寞（也有说老先生性格如此）。我们回到宾馆已经是十一点多了。尤可感者，此后和老先生几度邮件沟通。他因将赴杭州一行，不能接待而深为歉意。老辈学人的谦恭风范，令人感慨。



快走的时候，参观了“艺域漫游-郎世宁新媒体艺术展”，那种互动很赞。

李老师说冯院长的开幕演讲亦很棒，而且参加开幕仪式的都获赠纪念相册，可惜我们错过了。由这个艺术展，想起去九龙城寨那次，在屏幕前走来走去，即可随机放映，也是新技术在展映上的具体运用。而内地在技术上或许并不弱，但此类创意则大不如。当然也不光是创意了。内地博物馆之类，从硬件到软件的服务设施，都难以令人满意。不禁想起在沈阳参观九一八纪念馆时，李老师的评论。

附记一笔，在九龙城寨，不但吃到了李老师和师母推荐的泰国菜等美食，最逗的是邂逅了一张“毛泽东思想万岁”。后来发现，其作者就是李宏宇老师课上有学生提交的纪录片作业的主人公！

## **大公报与 USC**

访学期间探访了大公报社。做相关研究多年，去年8月中旬才去张季鸾榆林故宅（随后8月底在济南国际历史科学大学期间，得识季鸾先生姥姥家的几位晚辈亲戚）；今年才来到香港大公报馆。报史馆的展览还不错，只是不够细致，比如关于张季鸾的介绍，短短百余字，就几处有误。而且这样一份曾经的报纸，在今天的环境里面，落拓到此，叹……



耐人寻味的，还有重回久违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即 USC。上次来香港中文大学是 2005 年，我们是国际研究生当代中国研讨班 GSOC 第一期。一别十年，到山顶后下车，可能是激动过度，我差点儿找不到天人合一，惹得大家直乐。幸而看了路标，很快找到。

随后造访新闻学院的 C 研中心。上午出发前大雨，还担心无法及时赶到。很 nice 的陈韬文老师在办公室接待了大家，并赠阅《传播与社会学刊》以及招生简章等。正好学生有出国深造计划，派得上用场。没想到还惊扰了去年在榆林认识的罗文辉和黄懿慧老师，大家合影留念。随后午餐时，还遇到了学霸帅哥李理峰和潮人院长冯应谦。



说来有趣，此前 USC 的几任负责者都是政治学系的，如我们来那会儿是关信基，继任的是王绍光。现在则轮到新闻传播学的陈韬文老师来接掌。承蒙陈老师先容，给中心执行主任高博士打来电话，安排我们参观。高博士向我们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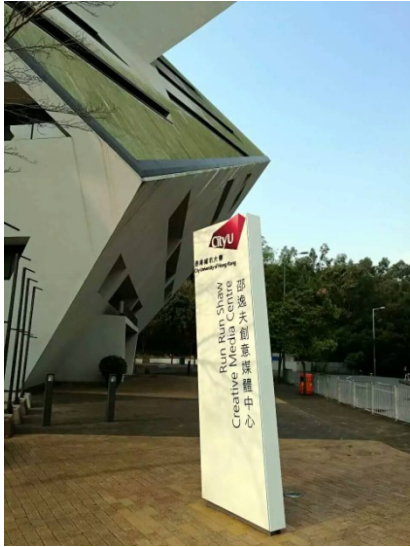
绍了中心的历史，以及丰富的馆藏。如被截获的志愿军档案、文革小报等。还看到了久违的内部参考，当然现在已经有复印本了，那时我看书的二楼小隔间还在。



可惜没见到已退休的前主任熊景明女士。后经燕舞兄帮忙，和熊老师通过邮件以及微信联系上。隔了几天重返中心，先查了数据库，随后和熊老师小聚。谈起做学问与社会担当，谈起他们家的小糯米和我们的小家伙；又聊起当年一起参加 GSOC 的朋友们（比如同为我们黄埔一期，现在港大政治学系任教的裴宜理高足阎小骏兄），希望有机会可以把大家聚起来，重访中心。

## 香港印象

RunRunShaw 居然是邵逸夫？还有个窝打老道？诸如此类的港式翻译令人莞尔。但是也有些东西则的确体现出某种传统的遗留，比如公交车上的“企”位，耐人寻味。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字词和语汇，颇得古风遗韵，令人感触古今中西在这弹丸之地的交汇融通。



还有不少惊异之处。比如在又一城，屈臣氏和万宁遥遥相对，几家电器市场也是比邻而居。这样的布局，在内地几乎不可想象。颇为现代的大型商场，和看似不合时宜的小门面、路边摊，也照样可以共存共生（林芬老师分享会上，谈及海港城的变迁，也是个有趣的例子）。再如居住区，也呈现出某种混杂。比如海棠路、又一居附近，多为中产社区；而南山屯则是公屋区（我们后来去的大浪湾则是有名的富人区，多豪宅）。这背后，究竟是市场机制、政治力量，还是什么因素，颇可玩味。

海棠轩附近学校众多。尤其是教会学校，而又不仅是基督教会的。在长洲岛和大澳，我们都看到了佛教学校。起初很惊愕。后来看得多了，联想到大屿山大佛之香火鼎盛，令人惊异于宗教的力量。而闹市中的志莲净苑也很赞，那里不叫俗气的香油钱、香火钱，而是冠以“净资”之名。建筑是仿唐式，骨骼清奇，幽静安逸，令人留恋。当然，正如其他方面一样，香港人的信仰也是五方杂处。地方性的天后宫等之外，还有各种传说中的圣人遗迹。而道教的黄大仙，更是香烟缭绕，香火鼎盛。



### 两个小场景

某次早晨外出，地铁上看到有两位在看报纸。很欣喜。发微博后，有熟悉香港情况的网友指出：其实多半是免费报纸。后来到税务大楼办事儿，在长长的过街天桥上，发现摆放着半人高甚至一人高的报纸，还有大量派报员，才觉信然。后来还领到一份免费报，虽然早就听说了，但真正见到还是第一次。本来还打算拿回来给学生们展示下的，后来却落在了宾馆。

顺便说下香港的媒体环境。大公报的历史名声可谓久矣，但是现在则光环不再，甚至沦落到只能靠补贴度日了。曾经的文汇亦然，现在与大公合成一个集团了。反倒是苹果、东方、信报等还可以。明报一年据称只有三千万的收益，也就和两间房产差不多。然则不少人还是趋之若鹜，愿意投资来办报，实际上显然是醉翁之意，别有所图。

有意思的是去大澳那天。有两个场景没能拍下，很遗憾。当时首先注意到如内地的那种麻将屋，这在西贡小街上也看到了。但相比于年轻人熟悉和热衷的新媒体，老年人们则另有打发时间的方式。去码头的路上，看到一老者在屋

外看报纸，是好久不见的难得景观。尤其有意思的，是去看渔村小桥时，路边屋子里，一老者悠闲地把腿搭在桌子边，一边闭目养神，一边听架子上的收音机。从窗口来回经过两次，一则手机像素太低，二则怕打扰了老人家的雅兴，没敢惊扰。但这两个场景，却牢牢定格在记忆中。



### 创纪录

在港这一个月，去的那天是晴天。当时曾戏言：上期多友他们都没看到多少太阳，我们却看到了。结果得意没多久，接下来的那些天，一直阴或者雨，多次行山计划更是因此泡汤（有时候不排除预报不准，以至于李老师说要带我们攻上天文台，活捉气象员）。直到走之前，难得又晴了一次天。因此有那么一些日子，我被禁止谈天气好多天 O(∩\_∩)O~这个季节，如此多之雨水，连老香港们都很惊奇。雨就是水，在粤语的理解就是财。李老师因此说：这预示着我们回去要发财了。托李老师吉言吧。

补一句，我走哪儿哪下，从沈阳到南京到扬州，再到香港。最后是广州那一夜，电闪雷鸣，航班都取消了。因此荣膺雨神，比萧敬腾还准。前两天回京



小住，本来想借此脱个帽，说明这可真的不赖俺，结果又下雨了！这个帽，可真是好戴不好摘啊！

我们不但创下了雨多的记录，而且以行山最少，但却拿下了一个新纪录，起码前无古人：行山还背着葡萄酒！O(∩\_∩)O~

这个月，酒，尤其葡萄酒，确实没少喝。起码没这么集中的喝过这么多葡萄酒（上次是2012年6月）。



当然照片也没少拍。我们这批人中，论厨艺，当然是向芬称神；论拍照，则当推老大刘斌，构图别致，技艺高超。有了这个发现，后来再去景点儿，我们再也不慌了，都把拍照任务留给了他，我们则尽情享受美景去了。反正回来由他分享就好啦。



（老大在塔门岛拍的这张，个人很喜欢。关于我身边的这种外星物种，到底是牛，是马，还是鹿，有请郑雯同志回答 0(∩\_∩)0~)

### 未尽的情谊

还有无数故事，可以写。本来也应该多写几笔李老师，包括谈治学、谈为人、谈生活、谈掌故，只是他要求大家少写他个人，所以就留待另篇吧。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李老师。

临走之前的某晚，小聚时瞻念前途，我情绪波动，喝的有些高，略失态，后来去信表示歉意；承李老师宽宏大度，让我不必过于自责。翌晚再聚，师母无意间说到，李老师很关心我的个人发展。从事过心理疏导工作的师母，还劝我别压力太大，为我开解不少。当时听了，心里真是暖暖的。



我相信我的这段经历绝不只是单独的个案，在生活上、工作上、学问上曾得到李老师，以及他和城大媒体与传播系精心培育的“多友”大家庭之关心、指点，并从中受益的“多友”，肯定还有不少。也因此，这个超越了学科、超越了地域、超越了各种世俗界限的大家庭，在当下的学术生态中才愈发显得珍贵。而能有幸进入这座无形学府，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福分！

